



满卷书香

何为真正成熟的小说?

◆ 思郁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汪曾祺全集》,盼了好几年,总是玩跳票,始终不见踪影。等不及,就先收了一套《汪曾祺集》。

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是很难区分的,他曾经跟香港女作家施淑青做过一个对话,题目就叫“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小说”,其中将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区别看作是“一道篱笆,并无墙壁”。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里有点故事,有点虚构,有点人为的热情。

读汪曾祺的小说,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尤其他后来的作品,开篇简单介绍人物出场,当你期待他以这个人物讲述故事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离开了人物,用很多闲笔不厌其烦地丰满人物生长的环境,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他说起来是行云流水,娓娓而谈,我们听着也是入神,几乎忘了还有人物,还有故事。讲到最后,他好像也忽然想起来,原来还有个故事没有讲,闲闲两笔,把人物日常中的小断章讲一段,就结束了。

与其说是听故事,倒不如说他闲聊,有时候又像听相声,又像听长辈讲家长里短,似乎走进了民俗博物馆,听一位渊博有趣的白发长者讲过去时代保存下来的鲜活片段,那种亲切和舒服,是阅读任何其他小说无法带来的。这符合他对小说的定义,“小说就应该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

我一直把汪曾祺的小说当作极简主义的典范,但是这个极简主义不是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和雷蒙德·卡佛极力宣称的极简主义。

汪曾祺的简洁首先是一种有意识的平淡,按照他总是强调的说法,小说不能一味地平淡,否则就会流于枯燥,而枯燥就意味着衰老。他的平淡与奇崛相得益彰,相互映衬。在平淡的句子中,突然跳跃出很多不合常规的句子,符合陌生化的新鲜感,给人造成很深的阅读印象。

其次,汪曾祺的简洁更接近绘画里的留白。在美国的时候,他曾做过一个演讲,他说自己的小说不太重视故事情节,最想创造出的一种意境,就像一种有意的小说,通过一个场景做到大量的留白。一个小说家不应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讲述出来,只能告诉一小部分,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去完善。

汪曾祺的早期小说学了很多西方小说技巧,这一点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中有很好的呈现。他早期的小说《复仇》《小学校里的钟声》等都是意识流的片段,学习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技巧,让他开始思索真正的小说是什么。他后来总结说,很多西方小说家,玩了一辈子结



构,最后才发现是被结构玩了。他最为推崇的契诃夫,完全不考虑结构,内容为王,写得轻轻松松,潇潇洒洒,执笔为文,已臻化境。

这看似平常的观点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当时先锋派小说家风起云涌。几十年后,我们再看当初这批先锋小说家,几乎都放弃了先锋式写作。因为小说的技巧毕竟是有限的,以致后来余华写《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又重新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

任何形式都要服务于主题和内容的创造。像卡佛的小说,提倡一点自传性题材的基础上进行虚构,都是生活中的一幕场景,一个片段渲染成篇,这也是汪曾祺的小说特点。你看《矮集》,按照他的小说背景编选的篇目,从他的家乡高邮,到读西南联大时的昆明,短暂游学时期的上海,解放后的北京,下放时期的张家口等,这样的编选很有意思,让我们明白他的写作与生活的环境有着密切关联。

在汪曾祺身上,不但汇聚了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前辈作家的写作意识,更有鲁迅的那种自我启蒙意识。这并非是说鲁迅、沈从文没有汪曾祺写得好,只是他们身上隐藏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决裂,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未成形,实验性、探索性的文体,阅读他们的作品总觉得跟现在的写作有很大的隔膜。但是在汪曾祺开始,几大传统开始汇流,在他的身上汇聚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开明与守旧等各种审美意识的小说传统。他延续了五四,继承了传统,吸收了西方,自成一派。自汪曾祺开始,中国当代小说写作的文体才是真正成熟的。

地球脉动

敦煌,文化汇流的地方

◆ 陈曼



“一定要穿上盛装去亲近古老的战场,感受当年的烽烟狼烟。”这是从我心底发出的声音。

当我穿上一袭大红唐朝古装,立于残破城墙时,远望河山,似乎听见“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看见烽烟狼烟卷过大漠古战场,金戈铁马的豪情瞬间涌来,我的心仿佛也驰骋在远古的时代,踏生于古老的历史里。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历代文人纷纷吟唱,表达离情别绪的场所在阳关。我似乎看到巍峨的城楼下,荒漠上厮杀的军队,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尸横遍野,血染沙场;但见万里之遥,大漠风吹着骑马的商旅,在落日长河,孤烟城堡中,只见风和时间的扬起过灵感,沉浮百感的壮歌依旧徘徊在西部之西。

阳关的威严早已荡然无存,它的辉煌需追溯到汉代。自西汉以来,许多王朝都把阳关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走丝路南道,东入阳关返回长安。边塞诗人岑参曾写下“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的诗句。宋以后,来自白龙堆的流沙侵袭虎咽,逼着人们东撤,阳关就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6000多公里的古丝绸之路,横贯甘肃东西全境1600多公里。从汉唐到元末明初近1100年间,河西走廊更是创造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空前盛况。而敦煌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西边之锁匙,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商品

人人都爱汪曾祺,这个可爱的妙人。在众多作家中,看不出汪曾祺的奇异之处,他有一篇小说叫《异秉》,其实他这人,有异秉。“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汪曾祺之所以在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靠的就是“与众不同”。

汪曾祺是一个达观主义者,乐生,洒脱。吃地方小吃,品四方美食。兴之所致,亲自下厨,做两个小炒,美滋滋地喝上几杯,然后铺上宣纸,随意画两笔。汪曾祺是性情中人,和父亲、和儿子的关系都很融洽,不像传统伦理的严肃,倒像朋友,恰如他所写的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



感情朴素见风流

有人这样评价汪曾祺的作品,每于朴素见风流,传神极了,也可用此语来关照汪曾祺的爱情。

施松卿,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汪曾祺还大两岁。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飘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施松卿在联大先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后转念生物系,最后转到了外文系。

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他们的女儿汪明说:“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汪曾祺原本应于1943年毕业的,因体育和英语不及格而留级到1944班。恰巧又遇上政府当局为适应战争需要,征调1944班的学生全部上前线当译员,不服从命令者,一律不予毕业。汪曾祺不愿去,这样,他就只能拿到西南联大的肄业证书。

为维持生计,汪曾祺去了昆明郊区的“中国建设中学”任教。这所私立的学校是周大奎和几个联大毕业的同学心血来潮的产物。在这所学校,汪曾祺认识了同事施松卿。

施松卿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还曾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没有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的寸骨。施松卿觉得,这种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

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汪曾祺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解。两人相见恨晚,随着接触的增多,爱情也于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教学之余,同事们常见到他俩结伴而行。

1945年8月,一个闲暇的午后,汪曾祺在昆明陪伴好友新婚的朱德熙、何孔敬夫妇,在昆明最好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片名是《翠堤春晓》。汪曾祺为两人的婚事,付出了

不少精力,两人过意不去,想留他吃夜饭。汪曾祺说夜饭不吃了,“我得回去看看松卿了”。那时,汪曾祺和施松卿已经是热恋之中了,两人挂念着对方,难舍难离。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汪曾祺去了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做了国文教員;施松卿则回福建小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她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冯至先生处当助教。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辞职于次年也来到了北平。由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处都成了问题。他只好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宿舍里搭了一个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施松卿接济,汪曾祺在这儿度过了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后来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为他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

北平和平解放后,汪曾祺参加了革命。1950年初夏,汪曾祺即将随军南下之际,与施松卿结束了长达6年的恋爱关系,结成了百年之好。



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



汪曾祺与老师沈从文

生活轻松见乐趣

1957年政治风暴开始了,汪曾祺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汪曾祺成为“右派”,其实,纯粹是为了完成右派指标任务,有人批判他的一首诗《早春》,有一句“远树绿色的呼吸”。笔者特意找到这首“诗歌”,很短的三两句,边看边想,那个时代真是荒唐。

汪曾祺下放到张家口地区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在这里劳动期间,他完成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白天画马铃薯,晚上看《容斋随笔》。画了一个整薯,还要切开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上世纪80年代前,汪家住在甘家口,住房紧张,汪曾祺晚上急着写文章,没找到地方,“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那模样,就像一只要下蛋的母鸡找不到窝一样”。一见他这个样子,施松卿问:“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汪郑重其事答:“瞎说,什么下蛋,是写文章。”时间长了,汪曾祺也觉得这个比喻不错,常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蛋。”那大蛋就是《受戒》。

1987年,汪曾祺应邀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邀请,去美国访问和创作。汪曾祺参观海明威农场,见到海明威夫人,“我抱了她一下。她胖

得像一座山。”汪曾祺在美国处处受欢迎,他的演讲风趣幽默,绝妙之处在于简短。汪曾祺在致施松卿的家信中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

作为戏曲编剧,汪曾祺碰上了20世纪的时代风云,他把自己的遭遇看淡了,把历史这部大戏也看透了。于是入乎其内,也超然于外。像《跑警报》这样的文章,明明是写战时的生活,一点也不觉得紧张,读起来轻松有趣。汪曾祺说,是用“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战争,那就是“不在乎”,精神是征服不了。

汪曾祺自己认为受儒家影响深,他欣赏宋儒的诗:“静观万物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笔者觉得,他的为人处世有儒家之风,审美趣味偏好道家。他喜欢清静无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然而,他写市井中生活的小人物,让人觉得温暖。汪曾祺的写作是怀着一颗温柔敦厚的仁慈之心,持悲悯情怀来观照大千世界。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大淦记事》《羊舍一夕》,散文《故乡的食物》《五味》《葡萄月令》,都清新自然,浑然天成。

汪曾祺在73岁生日时写下这样的联语: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晚年汪曾祺画几笔,玩赏后落座时,一定会想起儿时的高邮时光,想起在昆明,那时年少春衫薄,他和施松卿结伴而行。

汪曾祺:一个有趣的老头儿

◆ 刘宜庆



求学自由见散漫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大运河畔的水城,故乡的风物滋养了汪曾祺的精神。在他出神入化的散文中,可见小城的咸鸭蛋、野菜、寺庙、手工业者,散淡的文字,让人细细回味。

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汪曾祺先后跟祖父聘请的张仲陶、韦子廉两位先生学《史记》和桐城派古文,获益匪浅。可以说,桐城派的古文风格影响了汪曾祺终身。汪曾祺爱书画,也是受家庭的影响。

1939年8月,汪曾祺顺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汪曾祺曾随沈从文写作。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要好。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还给过120分。

在何兆武的《上学记》中,这样描述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级差不多,都八九岁,只能算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拖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

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巫宁坤回忆汪曾祺的文章中说,3人(巫、汪、赵全章)同住一栋宿舍,又都爱好文艺,“臭气相投”。每天课后,3人带着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上附近的文林街茶馆,一边喝茶,一边看书,聊天儿,或是写点儿什么。

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杨毓珉在《汪曾祺的编剧生涯》一文中回忆:他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山海云剧社”(社长是哲学系周大奎),1942年暑假,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杨毓珉负责舞台设计,汪曾祺专门管化妆。后来演出成功,还挣到不少钱。

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一书中回忆,朱德熙最欣赏汪曾祺,不止一次对何孔敬说,曾祺将来一定是了不起的作家。书中还多次写到朱德熙在大众楼茶店教何孔敬唱昆曲。可见,唱昆曲、演话剧、看电影,是当时联大师生的重要文娱活动。

艺海拾贝

毛志成笔下的敦煌纪实

“朝圣敦煌——甘肃画院毛志成中国画作品展”近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展出。毛志成是甘肃画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本次在莫斯科展出他创作的中国画作品近50件,主要以敦煌和中国西部风情为题材。他的作品以写实为主,突出中国西部藏族、新疆维吾尔族民俗生活,具有独特的创作风格。



本画作通过对人物神态的把握与传神,深刻表达了当地老百姓生活的现状。



本画作通过特写式表现了对生活虔诚而辛勤劳作的一家人。



本画作在审美上将人物置于地域文化来衍生其民族精神。